

WS43 组会议资料

一、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迅速，表现为研究的议题有了很大的拓展，对中国外交和国际重大问题的反应更加敏捷，对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及其动向更加了解，研究力量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同样，在中欧双方的推动下，中国的欧洲研究在最近十年里所取得的进步尤为突出，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和富有成果的阶段。

中国和欧洲在当今世界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而且都在探索如何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更好地发挥出来，从而维护地区和全球秩序的稳定，并向着更加公正、民主、文明的方向发展。中欧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在很多事务上也存在分歧，需要从各个层面开展战略对话来增进相互了解。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中国近年来的欧洲研究和相关政策思考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 1、当今中欧各自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战略的选择；
- 2、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
- 3、在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地区比较研究，包括欧亚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发展中的异同、跨区域合作等；
- 4、中欧各自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及影响；
- 5、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欧分别面临的主要挑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内容广泛的，而且存在争论。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选取了十篇文献，这些文章均由中国著名的学者或研究机构所发表，将为中外学者交流观点，展开讨论提供的基础。

二、文献述评

以下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专题。

第一组文章讨论了中国近年来的基本战略思想和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得到高度的重视，政府、学术界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西方学术界的思想、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国内，政策建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中国与国际的对话也变得日益活跃。

一般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国际战略以推进多极化为基础，近年来，中国又明确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等主张，对参与国际机制、推行多边合作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一度流行各种“中国威胁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美国近年来提出又“中国责任论”。“中国责任论”所反映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一些大国对中国角色的定位，而中国在这一“责任”问题上的回应，反映出中国对自身国际使命和地位的不同认识，这也构成了理解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背景。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在“中国的责任与‘中国责任论’”一文中对近年来国际社会中最流行的“中国责任论”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继“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之后，美国近年来提出的“中国责任论”现在是西方对华舆论最时尚的说教，已成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新延伸。新对策的基本思路就是鼓励和促使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以国际体系约束、规范中国并诱压中国承担维护和发展国际体系的责任。

作者承认，“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相比，确有一些相对积极的方面。首先，“中国责任论”开始承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作用和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并重新检点对华政策，这有助于务实地看待中国和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第二，“中国威胁论”的立论基点是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对中国采取的是遏制和对抗立场。“中国责任论”虽仍具有“中国威胁论”的内核，但已意识到同中国利益联系和依存加深，相对淡化了对抗一面，强调了合作的一面。这为双方发展互利合作创造了较为良好的氛围。但是，分析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要求”，可以看出美国一方面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却坚持所谓“两面下注”的政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周围构建“树篱”，依然是“遏制与接触”的老套路。实质上，“中国责任论”只是把“接触”[3]方面做出了更加明确、更为全面的诠释，说到底不过是美国对华战略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衍生物。

作者强调，对“中国责任论”，首先要全面分析，既要认清其实质，又应重视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要始终遵循独立自主的原则，对美国所谓的中国责任综合考虑，坚持原则，决定取舍，千万不能以为美国“瞧得起”中国而盲目乐观，更不可因此自我陶醉而模糊视线。第三，要对责任的性质和我国担负责任的能力如实估计，心中有数。对美国提出的那些“责任”，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在那些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方面加强同美国的合作，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第四，应对现行国际体系辩证地加以评估，既看到它在保持当前世界整体运作和基本秩序方面的作用，也看到其不公正、不合理的种种弊端，并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意愿，逐步进行改进与完善。必须明确，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同西方主张的“中国责任论”虽有吻合之处，但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是不能等同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营造和谐社会，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各国人民应尽的最伟大、最神圣的责任。

近年来，地区战略在中国外交中的重点地位日益清晰，正如唐世平和张蕴岭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一文所指出的，地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大战略。该文对中国的地区战略做出了系统的阐释，探讨了中国地区战略的理念、行为，并且对这一战略的成果做出了评价。最后展望了中国的地区战略的未来和对地区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文章指出，中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经济、社会与政治)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安全、经济与政治)。这一战略由四个核心理念组成。1) 大国理念。2) 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和地区“安全困境”的存在。3) “自我克制”。4) 做“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积极实行自己的大战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根据其大国的自我定位中国一直都保持了一种积极的“大国外交”其目标是与所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在国内外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第二，执行一个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的战略来抵御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的恶化。第三，中国在地区与全球的多边机制和倡议中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第四，中国对其愿意承担的责任仍是极其谨慎的。

有两个外部因素，将一如既往地影响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

一是美国的判断与中美间的互动。中国在和地区国家构建地区秩序时面临着极端困难的“踩钢丝”问题：如果中国拒绝加入地区秩序,这些人将认为这显示中国准备挑战国际规则与秩序(或现状)；如果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与规则制定,他们则会认为这显示中国将通过建造地区势力范围来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中国处于一种不管怎么做都不行的无所适从的境地。如果美国采取积极措施阻拦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在与地区内国家一起合作时不再对美国那么关注，加上两国业已存在的相互怀疑,就会形成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这将为双边关系增加另一个不确定因素。为此，中美需要接触，了解对方的意图并寻求某种和平共处的方法。

影响未来中国地区战略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善意的地区战略与积极的政策成果之间的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是否能够继续下去？由于中国在过去 20 年内所做的推进睦邻关系的一切努力，“中国威胁论”已在地区内丧失了部分听众。可以预计,只要中国保持对外部环境的乐观评估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认同,中国目前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将会持续下去。如果地区与世界对中国的崛起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并因此积极调整它们的对华政策，这反过来也会使中国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获得更多的国内支持。

最后,亚太地区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地区内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取向。对中国持续的不信任会制造一种新的“受害者综合症”。外部世界必须认识到:对中国的善意存有太多的不信任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灾难性后果:一个丧失耐心、丧失与人为善的愿望的中国。地区国家和中国必须携手来共同阻止这一灾难性结果的到来。

作者的结论是：十多年前,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仍在寻找一个有凝聚力的自我形象，因此对自己在本地区内的合理位置并不十分清楚。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对这一自我形象的艰难寻求，从而对自己在地区内的发展有乐观态度的基础。

第二组文章主要讨论欧洲经验及其国际扩散效应。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在“何为欧洲经验”一文中，认为欧洲经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欧洲经验主要包括欧盟的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以及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等。广义的欧洲经验，是指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解决国家间矛盾、保持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一些新理念、新办法和新行为方式。欧洲经验已经成为欧洲“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文相呼应的是张浚的文章：“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该文同样强调，冷战的终结突出了“区域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其中欧盟最为抢眼。欧盟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明显与美国不同，被看作是一个“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何谓“民事力量”，它在国际关系中有何创新？作者进一步指出，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制度化的一体

化”，欧洲的内部经验决定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外的行为方式。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多边机制的作用，不仅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巩固国际多边制度框架，而且致力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多边机制的发展。一个以“制度化”和“多边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日渐清晰起来。这种模式首先反映了欧洲人对双边外交、尤其是“均势外交”的扬弃；其次，欧洲人通过有意识地参与制度建设间接却又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影响，“制度”是欧盟这个“民事力量”发挥影响的重要渠道，也是其影响力的来源。亚欧会议进程的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欧洲成员所拥有的“间接的制度影响力”，也就是把欧洲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念推广到亚欧会议之中，从而影响亚洲成员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间接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刘昌黎（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在“东亚共同体问题初探”一文中全面论述了东亚共同体创设的历史过程，认为经过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东亚共同体已成为东亚各国的共同目标，然而，由于出发点不同，东亚各方对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和立场也不尽一致。展望未来，在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方面，既有区域内相互依存关系加强、区域内双边自由贸易和 APEC 贸易自由化发展等有利因素，也有在东亚共同体涵盖范围上的歧异和日本蓄意争夺领导权等不确定因素，其实现的道路将是曲折、艰难的。

第三组文章以中欧关系为主题，包括对中欧近年来的重大战略和政策进行评估，分析中欧关系发展的动因、基础、问题、趋势等。

戴炳然在（复旦大学欧中研究中心教授）“走向成熟、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中欧建交 30 周年感言”中强调，中欧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一关系有其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妥善解决遗留问题，如对华军售解禁和欧盟给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精心规划未来，推动这一关系成熟、健康、稳定地发展。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在“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本源初探”中提出，与现实主义视角相对应，对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的考察还需要重视双方各自的思想本源。虽然中国和欧盟在实力、品质、结构和速度上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但双方都寻求通过自身的调整与改革获得发展进而影响世界，因此二者之间较易达到妥协与合作。其利益交汇点也不仅在于双方关系丰富的层次和领域空间，而且还经由观念创新和制度性软力量所产生的影响朝第三方（即其他国际行为体）扩散，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将长期相互借重，优势互补，中欧关系因之所具有的和平性、独立性、丰富性必然不断增强。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在“新战略环境下中美欧面临的挑战”一文里，主要探讨了当前国际环境里发生的重要变化，认为近年来一个新的现象是双重标准全球化。也就是说，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对执行国际规则的新规范，即国际条约的适用对象由该国的类型决定，而不是由行为本身决定。大国采取双重原则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但现在与以往有了一些不同。以往是大国一方面自己采取双重标准的政策，一方面批评他国的双重标准政策。这如同人们自己行为自私但是还批评自私是不道德的。现在的情况是，大国不再相互批评对方的双重标准政策，而是接受双重标准原则，只要这种双重标准不用于自己，大国之间相互认可对方的双重标准政策。这使得大国国际行为日益趋向各取所需。进而，作者分析了中美欧分别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在传统安全威胁方面，除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外，中美欧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共同安全威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欧面临着略多的共同威胁首先是恐怖主义。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仅是和一般刑事犯罪一样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对中国安全威胁远远小于毒品、经济犯罪和地下黑社会。在经济安全方面，美欧并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经济安全问题；而中国则面临非常现实的经济安全威胁。在环境安全方面，中国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是严重的，但美欧这方面的问题却微不足道。中美欧三方正面临最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那么就是社会安全问题。就三方面面临的国际政治挑战而言，欧盟需要思考如何改善其效率，美国需要改变它的单边主义，中国需要改变对国际事务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作者的结论是，中美欧需要思考如何缔造共同的国际规范；还需要采取共同行动，一起来应对经济挑战，如失业、高油价、贸易冲突等，而不是各取所需。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